

鄂州革命史資料

中共鄂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

鄂州革命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共鄂州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
一九八九年七月

范 鸿 劍



刘 伯 垂





林明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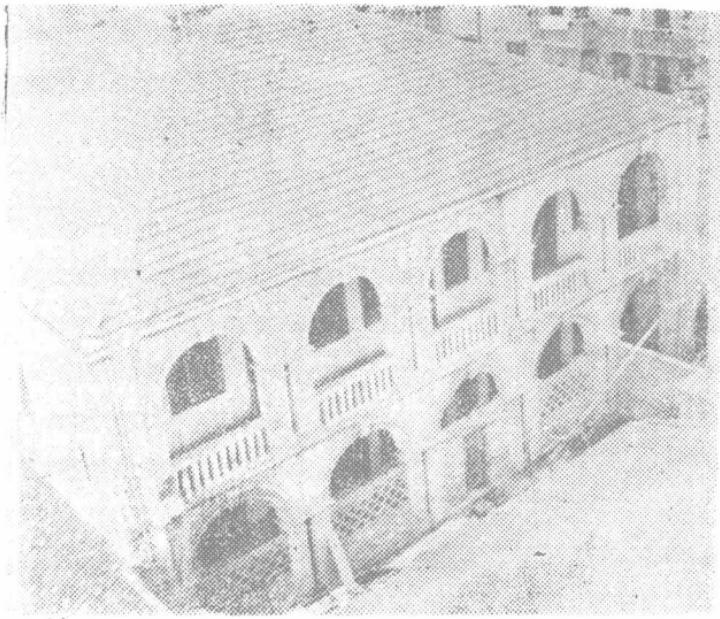
王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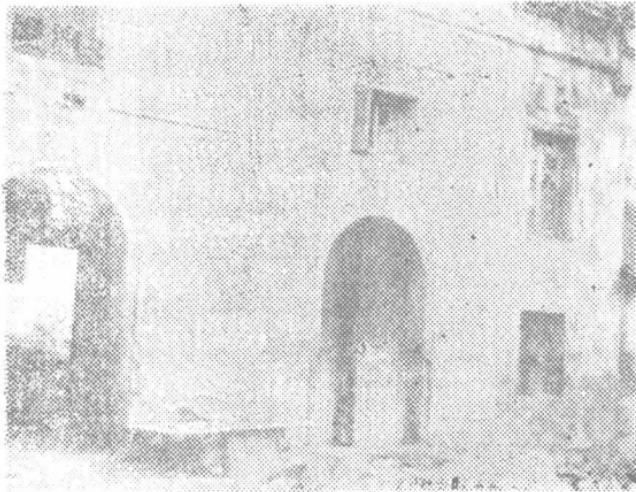
陈大发



张弦



独立十五师师部全景——遗址在今鄂州市鄂城区
大北门正街（贺龙师长住二楼）



一九二七年贺军驻地——今
鄂州市鄂城区城隍庙旧址

目 录

前言 (1)

党 史 人 物

范鸿劼	(3)
刘伯垂	(9)
张金保	(17)
夏石农	(33)
石怀谨	(35)
万松涛	(42)
林明炯	(45)
汪 洋	(48)
鲁毓藻	(54)
彭献廷	(57)
王时雨	(60)
赵飞克	(62)
黄全德	(64)
王 魁	(71)
陈大发	(75)
李 洛	(78)
陈大行	(86)
张 弦	(90)
袁 立	(103)

熊荣华..... (107)

专 题

贺龙将军在鄂城..... (108)

八一边境暴动..... (114)

回 忆 录

大革命时期的片断回忆..... 王文禄 (117)

回忆大革命时期..... 方映忠 (120)

忆贺军..... 陈少和 (123)

风雨话当年..... 刘守信 (126)

诗 歌

一战时期歌谣二首..... (129)

汪洋遗诗十首..... (130)

鲁毓藻遗诗一首..... (136)

资 料

文献、报刊资料摘编..... (137)

大 事 记

鄂州市革命斗争大事记(1921—1949)..... (192)

附 录

中共鄂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成员名单... (250)

前　　言

鄂州（原为鄂城县），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。

大革命时期，鄂州是革命重镇。1926年8月，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陆续派遣万松涛、石怀谨、胡时达、何耀祖、王爱群等共产党员，以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的公开身份来鄂城，成立了中共鄂城县特别支部委员会，石怀谨任书记。次年5月，正式成立国民党鄂城县党部，石怀谨、万松涛、胡时达等七人为执行委员，万松涛为常委，主持县党部工作。

在县党部的领导下，县、区、乡都建立了工会、农民协会、妇女会、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，在驻军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的大力支持下，鄂城城乡掀起了空前的革命高潮。

土地革命时期，鄂城的灵溪、马迹、贤庾、符石内四乡（当时鄂城的行政区划，以梁子湖为界分内四乡、外四乡），是革命活动的中心。1928年，鄂城恢复、重建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，成立了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县、区、乡农民协会。

1929年2月，建立了中共鄂城县特别支部委员会。7月，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改为鄂城县苏维埃。部分区、乡也相继建立了党委和苏维埃政权，苏区面积占全县三分之一。在此期间，彭德怀、何长工、李灿、滕代远率红军进驻鄂东南，来过内四乡，对鄂城的革命运动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抗日时期，鄂城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是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开辟鄂南的桥头堡，是新四军五师鄂南独立第五团、鄂南中心县委、鄂南政务委员会、鄂南指挥部、鄂皖湘赣指挥部、湘鄂赣边区党委的驻地，曾一度为鄂南革命的中心。郑位三、聂洪钧、王震、王首道、杨学诚、刘少卿、吴林焕、张体学、熊作芳、夏农苔等同志，先后在这里指挥过抗日斗争。

1942年，鄂南工委领导的六个县级边区工委，在鄂城境内就有四个，其中武鄂工委、鄂大工委建立较早，党、政、军、群各种组织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原突围回乡和奉命就地隐藏的党员干部，继续坚持斗争。在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，奉命做支前准备工作，他们积极策反、迎接解放军渡江、追歼国民党残部，作了大量工作。

鄂州革命斗争的发展历史，几经曲折，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道路。许多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为缅怀先烈，传史后世，教育子孙后代，我们编写了20篇党史人物传、专题、部份老同志的回忆录以及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大事记，汇编成《鄂州革命史资料》第一辑，并拟编续辑。由于水平和历史的局限。难免有欠周之处，敬希知情者指正和各方见谅。

中共鄂州市委党史办公室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范 鸿 勘

范鸿勘，鄂州市华容区葛店镇人。1897年出生于葛店范家“太和堂”。范鸿勘在家排行第六，少年时期，勤奋好学，聪颖过人，邻里无不称赞。

1918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，先入理工预科，后在化学系、英文系学习。这期间，他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，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。1919年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范鸿勘作为参与者和组织者，在游行集会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^①。次年，他与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和组织了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”，还同李大钊等人，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。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。

1920年初，关于山东问题，由原先五国共管，降为中日直接交涉。对此，中国人民极为愤慨，在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抗议浪潮。为此，天津学生多人被捕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担任北大学生评议部总务委员的范鸿勘，立即行动，以学生会的名义发出“万急通告”：“……山东直接交涉问题到了万急了；我国民当亡国奴的时候快到了。我们再不起来奋斗牺牲，天津的惨剧转眼就要到北京来了。……”元月30日，范鸿勘等主持召开文、理、法科全体学生大会，决定罢课，以声援天津被捕学生。2月4日，当范鸿勘等几十名学生在北京前门一带讲演时，被军警逮捕。当夜，被押送到卫戍司令部“惩办”。在囚禁中，范鸿勘遭到非人的虐待，日给一餐，

饭食“异常粗劣，有如畜生^②”。范鸿劼被捕后，“平民教育讲演团”的同学、战友李荟棠，在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》上发表了《欢送范鸿劼君入狱》的诗歌，对他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行动，给予了高度的赞颂^③。

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反动军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。范鸿劼出狱后，继续斗争。这年10月，他与李大钊、邓中夏、高君宇、黄日葵、张国焘、罗章龙、刘仁静等人，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^④。范鸿劼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一员，积极活动在学生运动之中。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随后在北大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第一个支部，他又是北大支部中活跃的一员，这时他常与邓中夏、何孟雄等满怀深情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人运动，是北京早期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。

1922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确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。8月，为贯彻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，范鸿劼、蔡和森、高尚德、刘仁静、缪伯英（女）等遵照党的指示，发起成立了“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”^⑤，呼吁“凡有志争民权者，皆可加入”，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外反动派。

1923年，“二七”大罢工遭到吴佩孚、肖耀南等军阀的血腥镇压。为了做好宣传群众和处理善后工作，范鸿劼与包惠僧、刘子通等人，在北京组织群众到参、众两院请愿，并联络参、众两院议员胡鄂公、彭吾先、范叔衡（范鸿劼的堂兄）、白玉逾、吴昆等人，对吴佩孚、肖耀南等人提出弹劾，并提出劳动法案，争取工人应享有集会、结社、罢工的自由^⑥。

同年秋，范鸿劼遵照党的决议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

党，并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任职，宣传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。

1924年3月，中共北京区委改组，范鸿劼当选为执行委员，并被推举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^⑦。不久，范鸿劼被派往上海工作。

1924年秋，范鸿劼从沪回京，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^⑧。这年年底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，范鸿劼被选为区委委员，后任组织部部长^⑨。当时，他与李大钊、赵世炎、陈乔年等一起，领导了整个北方——东到东三省、西到陕西北部，南到直隶、山东，北到内蒙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。并在北方区党委主编的《政治生活》周刊上，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^⑩，宣传革命，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来面目，唤醒民众与之斗争。对北方的革命运动，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。

1925年，党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党校，学员有二三百人。罗亦农主持党校工作。陈乔年、赵世炎、刘伯庄、范鸿劼等人曾担任党校教员^⑪，为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。

1925年5月30日，帝国主义在上海进行血腥大屠杀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李大钊、陈乔年、范鸿劼、赵世炎等区党委成员，动员各级党组织，在反帝国主义统一目标下，迅速将北京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。学生组织了“沪案雪耻会”，工人组织了“工人雪耻会”，并在区党委的领导下，于6月3日、10日、25日，连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，一扫反革命统治下古老北京的沉闷空气。

“五卅”运动以后，奉系军阀秉承日、英帝国主义的旨意，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，屠杀工农群众，封闭民众团

体，剥夺人民自由。日、英帝国主义还以大批军械援助军阀吴佩孚。从南面攻打国民革命军。帝国主义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。在全国反日、英，反张、吴的怒潮中，李大钊、陈乔年、赵世炎、范鸿劼等区委领导成员，领导着北方人民，在这年年底，连续三次在天安门举行大规模的“反日讨张”国民示威大会。后又举行有四万多人参加的“反英讨吴”国民大会，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。

1926年元月，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范鸿劼作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代表，参加了这次会议^⑫。会上，他和毛泽东一起，被任命为大会“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”委员。在讨论《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草案》中关于国共合作条款时，他和毛泽东等人坚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和革命性，反对要公开中共党的组织，公开党员身份的破坏性提案^⑬。在元月18日下午的大会讨论中，他明确地说：“共产党同志负有两种革命的担子，是另有秘密组织的。我们现在只有结合革命势力实行国民革命，共产党员也是同此目的。”“只有问他是否实行国民革命，其它不必问及，只要问在这种政策下，应该合作不应该，不必横生枝节。如果必要知道共产党员是多少、如何活动，实是陷共产党同志于危险地位^⑭”。坚持了我们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原则。

1926年，北京爆发了“三·一八”请愿斗争。范鸿劼和北方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李大钊、陈乔年、赵世炎以及北京地委主要负责人刘伯庄等人一道，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请愿斗争。当请愿斗争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后，范鸿劼与赵世炎、刘伯庄等人，连夜在北大召开党、团支部书记联席会

议^⑯，传达区党委的决定，并分头发动群众，为牺牲者在全城举行统一的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和隆重葬礼，再一次显示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威武不屈的斗志和决心。

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，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，范鸿劼同李大钊和北方区党、团组织的其他负责同志，转入地下斗争。

1926年4月，段祺瑞政府倒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。张作霖疯狂地加紧对革命的镇压，到处搜捕共产党人；区党委机关亦遭到敌人的监视；工友多人被捕。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，范鸿劼、李大钊等人除努力抓紧工作外，还要自己做饭，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以苦为乐的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。

同年10月，由于北伐军攻克武汉，武汉急需得力的同志去领导各方面的工作。1927年初，范鸿劼受党派遣，到武汉工作。不久，他又返回到环境艰苦的北京，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，继续战斗。

1927年4月6日，奉系军阀以及“京师警察厅”，出动数百名警察、宪兵，悍然不顾国际惯例，包围和袭击了当时北方区委秘密办公处——苏联大使馆，将李大钊、范鸿劼、谢伯俞、谭祖尧等一批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张挹兰等人逮捕。并于1927年4月28日杀害。范鸿劼牺牲时，年仅三十岁^⑰。

范鸿劼烈士短暂的一生，是伟大的一生，光荣的一生，他对我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他的英名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；他的光辉业绩，将永垂青史。

罗来文

注：

- ①③④ 《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》
- ② 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》第7号（1920年2月）
- ⑤ 《李维汉谈缪伯英》
- ⑥⑦ 《包惠僧回忆录》
- ⑧⑯ 《彭建华谈北京组织情形》
- ⑨⑫ 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》
- ⑩ 《李大钊传》
- ⑪ 《对彭建华同志回忆的几点补充》—王斐然
- ⑬⑭ 萧超然文章

刘伯垂

刘伯垂，名芬，号笏祥、恶紫、馨笏、百锤。鄂州市华容区刘家街村人。他是我党的早期工作者，是湖北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

1887年（清光绪十三年）古历正月初十，刘伯垂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。祖父刘德福，前清例授宣德郎，诰封奉政大夫。父亲刘弼亟，日本政法大学毕业^①。

伯垂童年入私塾。后读经馆。清末，留学日本，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^②。在留日期间，结识了孙中山、陈独秀等人，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，深感不推翻专制帝制，中华无振兴可言，于是加入了中国同盟会^③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。

辛亥革命后，刘伯垂从日本回国，任民国大元帅府秘书官。不久，调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任参事。袁世凯称帝后，他愤然辞职^④。1918年，赴广州，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，并在广州编辑《惟民周刊》^⑤，宣传革命思想。

当时，广东军政府还未脱离军阀的控制。为此，伯垂深为不满。1920年夏秋之交，他辞官北返武汉，途经上海，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，后被派回武汉筹建湖北的共产党组织^⑥。

刘伯垂返回武汉后，分别找董必武、张国恩、陈潭秋、包惠僧、郑凯卿等人交谈，都同意参加共产党，赞成成立武汉支部^⑦。

1920年10月的一天，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、张国恩寓所，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。会上，刘伯垂报告了上海共产党成立经过及组织状况；组织大家学习了《共产党宣言》和上海发起组起草的《共产党纲领草案》等文件；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；制定了工作纲领和组织生活制度。会上，他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和俄国革命的小册子。最后，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。从此，共产党湖北的第一个支部——武汉支部（后通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）就正式成立了。会后，刘伯垂用他从上海带回的活动经费，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支部机关，门前挂着“刘芬律师事务所”的牌子，以作掩护^⑧。

武汉支部成立后，刘伯垂和其他党员一道，积极从事发展党的组织，吸收了刘子通、赵子健、赵子俊、黄负生、林育南、项英等人入党；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；发起了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；主办了《武汉星期评论》（支部机关刊物）。他们还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，做宣传发动工作，并于1921年3月直接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，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：不增加车租；赔偿罢工期间工人的损失。取得了武汉支部建立后首次斗争的胜利^⑨。1923年，刘伯垂和包惠僧、林育南、项英等人，为了反击军阀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，组织和发动了中外瞩目的“二·七”大罢工。

在建立和发展国共两党合作关系上，刘伯垂作了不少工作。1923年11月，中共中央召开三届一中全会，通过了《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》，要求各地扩大国民党组织，凡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，我们的同志应为之创设^⑩。根据这一精神，当年12月30日，刘伯垂、项英就在武汉成立了“国民党